

《自警编》版本考略

汪玉雅竹¹

(1.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赵善璪为南宋时人,其代表作《自警编》成书于嘉定年间,内容采摭宏富,具有重要的校勘与辑佚价值。通过梳理现存版本的源流可知,该书主要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并旁及朝鲜等域外刻本。其中,南宋九江郡斋刻本为全书祖本;至明代,是书颇受重视,屡经翻刻,版本众多,虽在卷次编排与文本内容上与宋本差异较大,但对推动该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流传至朝鲜、日本后,又衍生出受宋、明两大系统共同影响的新刻本。目前,赵善璪《自警编》尚需在更全面、深入的版本校勘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更为完善的点校本,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

关键词: 赵善璪;《自警编》;版本考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53

《自警编》为南宋赵善璪所撰“士箴”类著作,辑录宋代名臣言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书被《四库全书》列入存目,馆臣评曰:“南渡而远,门衣立而党局生,议论繁而实意减,非复先民笃厚之风。故独膺陈旧德,以示断限欤。虽所列率人所习闻,而缕析条分,便于省览。其财赋门、兵门及拾遗一类,则并及于壬人媮夫,用垂炯戒,亦当时士大夫之药石。”^①可知赵善璪编撰是书,意在借前贤言行匡正时弊。全书分为学问、操修、齐家、接物、出处、事君上下、政事、拾遗九类,每类各分子目,凡五十有六。现存宋本主要为五卷本、不分卷本,至明以后,颇受推崇,不断有翻刻本问世,又出现了九卷本、十一卷本等等,传到朝鲜、日本后,更出现金昌集仿作之《后自警编》。

《自警编》采摭宏富,且多标注文献来源,具有重要的校勘与辑佚价值。在校勘方面,是书所载内容可为校订文献提供重要参考。如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卷三曾据《自警编》校正《国老谈苑》记载之失:“卷一称‘太宗尝幸龙图阁阅书’,考此阁乃太宗卒后所建,内置太宗御书,《宋史》以为真宗景德元年置。考《职官分纪》卷一五‘咸平四年真宗幸龙图阁’……宋赵善璪《自警编》卷六所记此事与《国老谈苑》略同,唯‘太宗’作‘真宗’,当是。”^②在辑佚方面,《自警编》所引文献,如张商英《论七臣疏》原篇多已散佚,幸赖此书事君类“上方励精有为”条得以存其梗概^③。清人编纂《全宋文》时,即自《自警编》中辑录该文,并明确标注出处。可见,《自警编》对于古书的辑佚与考订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作者赵善璪,字德纯,南海(一作歙)人,宋宗室。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绍定中前后在世,虽《宋史》无传,然其生平事迹犹可自方志中窥见一斑。他早年以父荫入仕,授承信郎,却非安于门荫之辈,少时即胸怀远志,笃志向学,终在嘉定元年(1208年)登进士第,从此步入仕途。^④其仕途中最令人称道者,在于临危不乱的担当与为民请命的气魄。通判广德军时,适逢大饥,他毅然借调官仓钱款购粮赈济,使百姓得以度过危难;治理兴国军期间,他以卓越政绩赢得“有能名”之誉;及至知江州时,面对水患引发的粮价飞涨,他果断从各地调集三万余斛粮食,分拨各县,迅速平抑物价,保全一郡生灵。朝廷嘉奖其政绩,屡次擢升,晚年更召为尚书郎,颇受重用。惜天不假年,未几即以疾乞祠,数月后溘然长逝,官至中奉大夫。^⑤所著《自警编》一书,成为其生平思想的重要见证。

2015年出版的《全宋笔记》收录《自警编》整理本,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明嘉靖本。然二者实属同一版本系统,皆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本散佚与讹误,影响整理品质^⑥。郭平《两部宋版精品〈自警编〉皆为后世祖本》、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刘冰《绝世双“璧”——两部宋版〈自警编〉》对辽

作者简介:汪玉雅竹(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史、历史文献学。

^①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3《子部·杂家类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61页。

^②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7页。

^③ (南宋)赵善璪:《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果亲王本),第4册,第65页。

^④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47页。

^⑤ 弘治《徽州府志》卷8《人物志》,第1026页b。

^⑥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3页。

宁图书馆所藏的两本宋刻本进行了校勘和考证, 但其所涉及的版本数量有限^①; 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对此书的编纂特色、版本流传、文献价值进行了充分论证, 但在版本流传部分未对版本源流进行考述, 论述稍显简略^②; 谢冰欣《宋元箴规小说研究》对《自警编》作者、版本体例、价值及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其版本分析偏重序跋梳理^③; 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 系统梳理《自警编》现存诸本之源流关系并评鹭其优劣, 以期为后续整理与研究提供基础。

一、南宋九江郡斋刻本系统

南宋九江郡斋刻本系统包含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和依其补刻、翻刻的各种版本, 主要有五卷本、不分卷本。

(一) 南宋九江郡斋刻本(下简称宋本)

宋本是指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刊刻于九江郡斋的祖本。此本保留有赵善璪前序, 序中言明, 《自警编》始撰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 成书于嘉定十七年(1224年), 时隔八年后首刻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九江郡斋, 由此形成了唯一一种宋本。^④

《自警编》宋本现存四部, 分藏三处: 辽宁图书馆藏有两部, 分别为钤有“果亲王府图书记”之果亲王本, 及卷末附宋实颖跋语之宋实颖本; 国家图书馆与台北“国家图书馆”亦各藏一部, 皆为残本。就卷帙形态而言, 除辽宁图书馆所藏宋实颖本为不分卷外, 其余三部均为五卷本。诸本版式统一, 皆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 白口, 左右双边, 双黑鱼尾。版心中题“自警编甲至戊”, 下标刻工姓名, 如苟道氏(或省作“苟”)、谢友、民、王必文(或作“必文”)等。书中于征引文献处, 皆于条末以小字标注出处, 字旁附有句读。宋讳如胤、耿、完、慎、惇、敦等字时见缺笔, 然避讳未严。卷前载《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及全书目录, 目录分“学问类、操修类、齐家类、接物类、出处类、事君类上、事君类下、政事类、拾遗”九类, 下系五十六子目。全书按内容分卷如下: 甲卷为“学问、操修”, 乙卷为“齐家、接物、出处”, 丙卷为“事君上”, 丁卷为“事君下”, 戊卷为“政事、拾遗”。卷末附《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璪再书》。

1. 果亲王本(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00776)

足本, 卷末有翁方纲观款: “乾隆四十二年岁在丁酉夏六月十五日文渊阁校理翰林编修大兴翁方纲获观”。书中钤有“王世懋印”“敬美甫”“果亲王府图书记”等鉴藏印, 据此可知其递藏源流: 明代经王世懋收藏, 清代入果亲王允礼府邸。

2. 宋实颖本(第一期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00777)

不分卷, 残本, 现存仅甲、乙、戊三卷, 较足本少事君类(上)、事君类(下)两部分, 即丙、丁两卷。卷末附康熙十九年宋实颖跋, 其文曰: “右《自警编》壹拾贰本, 俱南渡时旧刻, 系虞山顾玉书先生所赠。庚申春二月初三日天气阴寒, 朗诵一过, 觉太和自胸中流出, 后生小子勿易视之。”^⑤据此可知, 宋实颖递藏之时此本尚为全帙。据康尔平考察, 后人为掩饰残缺, 曾将目录中丙、丁两卷篇名及子目挖除, 并剔除版心甲、乙、戊等卷次标识, 伪作完本之貌。^⑥故而, 宋实颖本之原貌应为五卷本。是书钤有“东沙居士”“真赏斋印”“秦逢氏”“又玄斋考藏图书印”“既庭”“实颖之印”等藏印, 据此可勾勒其递藏脉络: 明代先后经华夏(真赏斋)、秦四麟收藏, 入清后归宋实颖插架。

3. 国家图书馆藏宋本(索书号 09826)

残本, 现缺丙卷, 钤印“京师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曾着录此本: “每半叶十行, 每行二十字……此书余凡见数本, 北京图书馆及袁寒云(克文)藏皆是也。”^⑦《中国善本书提要》着录^⑧。

4.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本(书号 07569)

残本, 现缺戊卷“政事、拾遗”两类, 钤印“沈慈印记十峰监藏”“十峰秘玩”“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枕碧楼藏书记”“曾在云间啸园沈氏”“贞”“元”“伯雅”等。其中“贞”“元”“伯雅”三印归属尚难确考, 然据其余诸印可勾勒其递藏脉络: 此本曾为清代沈慈(十峰)所藏, 后归沈家本(枕碧楼), 终入藏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着录。^⑨

四本虽同为宋本, 亦有文字差异。如学问类“陈忠肃公在通州张无尽入相”条, 宋实颖本小字注“何执中邓洵”, 他本皆注“何执中邓洵武”。查《自警编》拾遗类有: “如薛昂, 蹇序辰, 何执中, 邓洵仁、洵武”^⑩之载, 可知邓洵武为人名, “邓洵”当为“邓洵武”之误。又操修类“陈忠肃公穉虽闲居容止尝庄”条, 宋实颖本作“尝”, 他本皆作“常”。可知宋实颖本应为初印本, 他本为后印本, 后印的过程中于初印之失有所订正。

(二) 宋刊明补本

宋刊明补本现存有三本, 分别藏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香港大

^① 郭平:《两部宋版精品〈自警编〉皆为后世祖本》,《辽宁日报》2023年9月6日,第1版;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3期。

^② 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10期。

^③ 谢冰欣:《宋元箴规小说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④ (南宋)赵善璪:《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1册,第5页。

^⑤ (南宋)赵善璪:《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3册第212页。

^⑥ 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图书馆学刊》(辽宁)1982年第3期。

^⑦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7页。

^⑧ 王冲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杂家类·杂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7页。

^⑨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778页。

^⑩ (南宋)赵善璪:《自警编》,辽宁图书馆藏南宋九江郡斋刻本(宋实颖本),第652页。

学冯平山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皆为五卷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为不分卷本，三本行款同宋本，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镌“自警编甲至戊”。下记刻工，征引典籍会在每条内容末进行小字标注，字旁附句点。卷前有《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卷后有《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璪再书》。

1.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下称汪镛本，因有汪镛手书题记故称；书架：善 178/600）

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五卷，第二、三卷抄配，缺目录。卷末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汪镛手书题记。钤印“汪镛颂堂”“莫棠之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等。可知汪镛本递经汪镛、莫棠、刘承干等人收藏。此本见于《嘉业堂藏书志》。^①

2.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下称毛晋本，因有毛晋钤印故称；书号 07568）

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钤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子晋氏”“毛晋之印”“子晋”“毛扈之印”“斧季”“泰峰所藏善本”“曾在上海郁泰峰家”“苕圃收藏”。可知毛晋本先后由毛晋、郁松年、张钧衡收藏。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吴兴（今湖州）南浔镇人。在南浔南栅补船村鹁鸪溪畔建“适园”。另建有“九松精舍”“嘉荫草堂”“择是居”“燕喜庵”“六宜阁”等，藏书十余万卷，精本亦多。国民党撤退时，将其善本一部分运至台湾地区，毛晋本亦在此时转由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

3. 静嘉堂文库藏本（资料番号 74）

不分卷，版心无“自警编甲至戊”，但记刻工名。钤印“神游心赏”“子子孙孙保之”“项子京家珍藏”“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子京父印”“项叔子”“墨林山人”“墨林玩秘”“樵李”“项元汴印”“方氏世昌”“天籟阁”“朱方真逸”“钱现之印”“含晖堂”“臣陆树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等。可知该本曾由项元汴、丽宋楼先后收藏，后流向日本静嘉堂文库。《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仪顾堂集》《丽宋楼藏书志》《静嘉堂秘籍志》着录此本^②。

经以宋本与宋刊明补本对校，可知汪镛本与静嘉堂文库藏本仅存个别脱字。其中，静嘉堂文库藏本虽为不分卷本，内容与其他版本大体一致，唯“张子韶曰管仲不学”一条脱“瞻仰世皆”四字。相较于此二本，毛晋本脱文现象较为严重，多达二十余处，涉及学问类如“范纯仁尝曰”“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张魏公在京师”“朱氏小学书嘉言篇”“范文正公少与刘某同”诸条；见识类如“李文靖公沆为相”“南海蛮酋虐其部人”“建中之初右司谏陈公莹中”等条；以及器量类“程氏遗书云”等处。此类脱字多因保存不善致字迹漫漶，并非源于刊刻之误。此外，在学问类“荥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条中，毛晋本作“尽力乎苒内者”，而他本皆作“尽力呼其内者”；该本“苒”字有明显涂改痕迹，系于原刻“且”字之上叠写而成，亦可见其文本之不可靠。综上可见，毛晋本的校勘价值明显低于汪镛本与静嘉堂文库藏本。

（三）明刻本

根据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方孝孺《自警编序》与嘉靖七年（1528年）赵鹤《重刊后序》^③所载，洪武年间，蜀献王朱椿因闻方孝孺贤名，特延聘其为世子师。同年，朱椿将《自警编》重新刊刻，流布于世。至嘉靖七年，蜀成王朱让栩复命赵鹤再次刊印，以教化士人。因此，在明代前中期，《自警编》于四川地区流传较广，颇受重视。

现存宋本系统之明刻本皆刊刻于四川，主要有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覆宋刊本（以下简称“蜀藩覆宋刊本”）与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以下简称“蜀藩重刻本”）。二者行款一致，均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中镌“自警编甲至戊”。书中记录刻工姓名，并于每条引文之末以小字标注出处，字旁附句点。卷前载《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卷末附《端平改元三月旦善璪再书》。

1. 蜀藩覆宋刊本（书号：故善 008134-008145）

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钤印“樵李”“墨林秘玩”“项子京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翠筠馆印”等，可知该本先后由陆时雍、项元汴、清宫“天禄琳琅”收藏。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曾录入该书：“前有嘉定甲申善璪自序，后有善璪再序（时端平元年侵木于九江郡斋）。大字本。樵李项氏藏。”^④

2. 蜀藩重刻本（索书号 13847）

国家图书馆藏，卷前有嘉靖七年皇宗适菴《重刊自警编序》、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自警编序》，卷后有嘉靖七年《赵鹤重刊后序》。仅一个“乙亭田氏藏书之印”钤印。根据其书后赵鹤重刊序可知，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底本为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覆宋刊本。

上文已论述到，宋实颖本在学问类见识中标注小字“何执中邓洵”，少“武”字；操修类诚实中“陈忠肃公瓘虽闲居容止尝庄”条，“尝”应改为“常”，此为宋实颖本之误。在诸本中，唯蜀藩覆宋刊本和蜀藩重刻本有此误，因此蜀藩覆宋刊本、蜀藩重刻本应属宋本系统。此外，蜀藩覆宋刊本又有可补明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之处。蜀藩重刻本多处都有字体漫漶的现象，如卷九拾遗类“王荆公知州鄞县”条、“王荆公再秉政”条、“卢多逊贬朱崖”条、“石介既卒”条、“真宗既疾甚殆”条等。

二、明嘉靖十九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系统

^①（清）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撰，吴格点校：《嘉业堂藏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7页。

^② 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杂家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8页；（清）陆心源撰：《仪顾堂集》；卷20《宋版自警编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37页；（清）陆心源撰：《丽宋楼藏书志》卷58《杂家类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8页；[日]河田黑撰、杜泽逊等点校：《静嘉堂秘籍志》卷28《杂家类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80页。

^③（南宋）赵善璪：《自警编》，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七年蜀藩重刻本，第5册，第90-93页。

^④（清）瞿镛、（清）杨绍和、（清）潘祖荫：《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0页。

据万历二年(1574年)潢南道人《自警编重刊序》所载:“迨我熙朝一梓于蜀藩,再刻于岭表,复广于闽海滇南之区,其流布遐迩而昭然,在人耳目惟时。”^①由此可见,《自警编》在明代的流传范围极为广泛。该书先由四川刊印,继而于两广地区重刻,随后更流通至云南、福建等地。潢南道人(即益宣王朱翊钊)封藩于江西南城,获此书后遂命南城令李侯重新刊刻,进一步推动其传布。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系统,存世数量颇丰,目前可见包括陈光哲原刻本、陈善刻本、瑞州府刻本等八种刻本。该版本系统的版式具有较强共性:除和刻本为半叶九行二十字外,其余皆为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双黑鱼尾,版心统一镌有“自警编卷之一至九”字样,且均未记录刻工姓名。在边栏样式上,除陈光哲刻本为左右双边、戴洵王弘海本为四周单边外,其他诸本均为四周双边。

就文本内容而言,该系统与宋本系统差异较大。首先,宋本征引典籍出处之小字标注,诸本存在大量脱漏的现象。其次,该系统皆为九卷本,其目录结构统一划分为“学问类卷之一”至“拾遗类卷之九”,共九卷五十六子目,与宋本系统之五卷分帙迥然有别,体现出按类别独立分卷的编排特色。再次,诸本相较宋本系统多有脱讹,唯和刻本情况稍好。以宋本与诸本对校,笔者发现在卷一学问类中,有二十二条内容以上七个刻本皆脱,四条陈善刻本、瑞州府刻本、徐棻刻本、李超刻本、戴洵王弘海本和《四库全书》本脱,一条瑞州府刻本、李超刻本和戴洵王弘海本脱,而和刻本皆不脱。此外,陈善刻本独脱器量“韩魏公徙开封府推官”“王沂公曾状元及第还青州”等五条,戴洵王弘海本独脱学问“范纯仁教子弟”“张魏公在京师”等五条。另,在卷一中各本相较宋本共有文字出入二十处,涉及“李文靖公作相”“张忠定公守蜀”“范纯仁尝曰我平生所学”等条,共有脱字二十六处,涉及“真宗祀汾阳”“杜祁公老居睢阳”“李文靖公沆为相”等条,共有衍字十一处,涉及“真宗祀汾阳”“向敏中除右仆射”“吕正献公着平生未尝较曲直”等条。最后,各本卷前多载有《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等内容而宋本系统无,亦为此系统之共同特征。

(一) 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索书号善 228/190)

今藏于杭州图书馆。该书卷前刊有嘉靖十九年林庭棊所作《重刊自警编序》。书中钤有“冯贞群印”“伏跗室藏书印”二方,皆为近代藏书家冯贞群遗印。冯氏为清光绪十七年(1903年)秀才,筑“伏跗室”以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宁波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将毕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

(二)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陈善刻本(缩微品)

今藏于国家图书馆。该本卷首收录嘉靖十九年林庭棊《重刊自警编序》、李文田手书跋语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卷末附莊一俊《自警编后序》。全书未见藏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自警编九卷,明嘉靖滇南刊本……每类各分子目,凡五十有五。”^②所着录原本乃该刻本。

李文田跋语曰:“右序见宋刊本,藏吴县潘尚书(祖荫)家。光绪十六年元月藉以校此本,乃知明刊本与宋时原本回异。惜尚书所藏宋,祇是残本未完,然每门以校,次段数增多,且所揉掇原书,多不改,并具出处,为可贵也。”^③可知,陈善刻本在内容编排、段落数量及文献出处标注方面,与宋本已有显著差异。此外,该本可见前人校笔,对宋本中的脱文、衍文及讹误进行了全面校补:脱字补于天头,衍文以笔划除,误字则在右下方标注正字。

莊一俊《自警编后序》则述及陈光哲刊刻《自警编》之缘起,言其在赴任浙江途中,得到“形山公”批注的《自警编》,赞叹其为“嗜好无逾公者矣”,并每日与陈光哲共同研习请教,深得陈光哲推重,遂促成此本之刊行流传。故可知,陈善所得底本应为陈光哲刻本。

(三) 明万历元年(1573年)瑞州府刻本(书号 07571)

今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该刻本卷首汇集了历次重刊的重要序言,包括万历元年徐棻《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林庭棊《重刊自警编序》以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卷末则附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书中所钤“延古堂李氏珍藏”印,表明其曾为延古堂李士珍家族之物。《中国善本书提要》着录^④。据《善本书室藏书志》记载,此本源于万历元年徐棻巡抚江西时以滇本(即陈善刻本)为底本校刊;至万历四年徐氏移抚浙江,又于壮猷堂加以重刊。^⑤

(四) 明万历四年(1576年)徐棻刻本(索书号 110542)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该刻本卷前依次收录明万历四年徐棻《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林庭棊《重刊自警编序》、万历二年潢南道人《重刊自警编序》及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书末则附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与罗汝芳《重刊自警编后序》。书中钤有“嘉惠堂丁氏藏书”印,可知此本曾为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旧藏。

(五) 明万历五年(1577年)李超刻本(索书号 A00483)

^①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年徐棻刻本,第1册,第15-19页。

^② (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9《子部九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第112页。

^③ (南宋)赵善璵:《自警编》,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陈善刻本,第1册,第7页a。

^④ 王冲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杂家类·杂纂》,第337页。

^⑤ (清)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卷19《子部九下》,1986年,第113页。

国家图书馆藏。卷首有万历四年徐枋《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十九年三山小泉林庭樾《重刊自警编序》、万历二年潢南道人《重刊自警编序》、嘉靖四十年陈善《重刊自警编序》、明万历五年李超《重刊自警编序》。卷末有莊一俊《自警编后序》、罗汝芳《重刊自警编后序》。钤印“天阁”“古司马氏”“黄冈刘氏校书堂藏书记”“黄冈刘氏过眼”，“天阁”“古司马氏”范钦之印，余二印藏主身份待考，应为湖北黄冈的刘姓藏书家。

(六) 明万历年间戴洵、王弘海重刊弘治十五年(1502年)本(番号308-0047)

日本公文书馆内閣文库藏，无格。无任何序跋但有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批注、校者姓名。每页有黑色、红色两种批注字体。黑色字体在每页上方，大多已模糊不清，红色字体则对正文进行标点和校补。钤印“浅草文库”等。

(七) 《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本，无序跋亦无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但卷前有馆臣所写提要。《嘉业堂藏书志》着录：“《四库提要》着录九卷，盖明嘉靖十九年三山林庭樾重刻之本也。”^①

(八) 日本享和二年(1802年)刊本(下称和刻本;番号308-0046)

日本内閣文库藏，卷首有明洪武二十七年方孝孺《自警编序》，卷末有朝鲜金安老跋。钤印“大日本帝国图书印”“浅草文库”“昌平阪学问所”。

和刻本、陈光哲本虽同为九卷本，类目也基本相同，但从内容来看，两本有些差异。首先，在卷一中，陈光哲本所脱二十二条及征引典籍出处，和刻本皆不脱。其次，陈光哲本很多脱漏、讹误之处，和刻本改正了部分，但又有一些保留了下来。比如学问《荜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条，陈光哲本作“荜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于太学，与黄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后复从孙先生复……而明道先生颢及横渠张先生载，孙公觉李公常”^②。而和刻本作“荜阳吕公从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学，与黄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后复从孙先生复……而明道先生颢及横渠张先生载，兄弟孙公觉李公常”^③。和刻本将“荜阳”之误进行了改正，并补上陈光哲本所脱“瑗”“兄弟”，但和刻本、陈光哲本同作的“复从”，宋本作“徧从”。又《李文靖公作相》《张忠定公守蜀》等条，和刻本、陈光哲本讹误之处皆同。故此本应属陈光哲刻本系统，同时用宋本校补而成。

三、其他刻本

在宋本和明本系统之外，又有一些刻本版式独特，与主流的两个系统不同。

(一) 朝鲜刻本

朝鲜刻本主要有朝鲜显宗五年刊本、吉田意庵旧藏朝鲜古活字本。在内容与条目上，此两本以宋本系统为基底，保留了宋本五卷的架构、完整的条目数量及征引出处的小字标注，文字亦多同宋本之正；在版式上，又明显受到明本系统的影响，如卷首增入明本系统特有的《宋名臣名儒姓氏号纪》，且在分类上有所调整。

1. 朝鲜显宗五年刊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

五卷，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四辑收录。白口，四周单边，双花鱼尾，半叶十行十七字。卷首有明方孝孺《自警编序》。

2. 吉田意庵旧藏朝鲜古活字本(番号308-0048)

五卷，日本内閣文库藏。半叶十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其分类相较宋本有所不同，共十二类五十六子目，在事君类增加了两类、政事类增加一类。卷首有明方孝孺《自警编序》。钤印“浅草文库”等。

(二) 明翻宋本(索书号11831)

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半叶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下刻“自警编金、木或其他字”。征引典籍有小字标注，卷首宋嘉定甲申正月望赵善璪序。其分类相较宋本有所不同，共十一类五十六子目，在事君类增加了一类、政事类增加一类。从内容上来看，明翻宋本与宋本系统较为相似。

四、结语

《自警编》一书自南宋端平元年九江郡斋刊刻之后，至明代被四川、云南、江浙等地官员屡加翻刻，这一流传现象与明代官箴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明中后期朝局动荡，党争激烈，宦官权臣相继专权，致使士风日趋颓靡。面对如此时局，有识之士深怀忧思，亟欲重整士林风气、砥砺士节。而《自警编》藉由一系列生动的宋代名臣言行，将“清、慎、勤”等道德理念具象化为可感可循的行为典范，为明代士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参照，从而精准回应了这一时代中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困境与道德焦虑。

此书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且兼及朝鲜等刻本：宋本是此书的祖本，亦为最可靠的版本，但后世流传不及陈光哲刻本系统；到了明中后期，此书刊刻频繁，流传甚广，推动了此书的版本普及，但内容和版式距宋本原貌颇有

^① (清)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撰，吴格点校：《嘉业堂藏书志》卷3《子部·杂家类》，第468页。

^② (南宋) 赵善璪：《自警编》，杭州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九年陈光哲徽垣精舍刻本，第1册，第18页。

^③ (南宋) 赵善璪：《自警编》，日本内閣文库藏和刻本，第1册，第9页。

差异，脱讹甚多；朝鲜等刻本则保留了宋本内容，又受明本影响。2015年出版的《全宋笔记》对《自警编》进行了整理，整理者在“点校说明”中说：“明清刻本多加以删削，如明嘉靖陈光哲薇垣精舍刻本，较四库全书本少数十条，但四库本无作者自序。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以明嘉靖本为校本，并与宋诸文献对勘。”^①但根据本文分析，文渊阁四库本和明嘉靖本皆属陈光哲刻本系统，脱讹甚多，选择此两版本进行整理，实难反映该书原貌，价值不高。故笔者建议，后续整理应以辽宁图书馆所藏果亲王本这一足本为底本，以宋实颖本、静嘉堂本、洪武蜀藩本、陈光哲刻本、朝鲜活字本等为对校本，另以陈善刻本、徐棻刻本、日本享和二年刊本等为参校本。以期在版本源流清晰、校勘依据充分的基础上，推出一个更接近原貌的权威整理本。

参考文献：

- [1]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1061.
- [2]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M].北京:中华书局, 2005:327.
- [3] 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5647.
- [4] 傅璇琮等.全宋笔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3.
- [6] 康尔平.馆藏宋刻《自警编》着录考[J].图书馆学刊,1982(3).
- [7] 贾林晓.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珍本《自警编》考论[J].图书馆学刊,2021(10).
- [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777.
- [9]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37.
- [10] 瞿镛,杨绍和,潘祖荫等.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5:300.
- [11]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112.
- [12] 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嘉业堂藏书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468.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of Zijing Bian

Wang Yuyazhu¹

¹*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Zhao Shanliao, a schola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Zijing Bian*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The book is rich in content and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textual coll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lost texts. By examining the lineage of its extant edition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work primarily developed into two major edition systems, with additional versions printed abroad, such as in Korea. Among these, the Southern Song Jiujiang Prefectural School edition is the earliest 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all later editi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book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was repeatedly reprinted, resulting in numerous editions. Although these Ming edition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he Song edition in terms of chapter arrangement and textual content, the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work. As the book spread to Korea and Japan, new editions emerged, influenced by both the Song and Ming systems. At presen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ritical annotated edition of Zhao Shanliao's *Zijing Bian* is needed, based on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collation of its various editions, to better serve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Zhao Shanliao; *Zijing Bian*; Edition Research

^① 程郁：“点校说明”，（南宋）赵善璿撰、程郁整理：《自警编》，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3页。